

黃朝琴回憶錄(二)

黃朝琴遺著
王紹齋校訂

十二、脫離日籍的經過

我自民國八年恢復了中國國籍後，本無時不想脫離日籍，還我清白之身；惟日本法律規定：脫籍後一年內若不將在臺所有不動產處分，即將充公歸國庫。而當時我在臺戶籍仍是戶主，所有祖產都是我的名字，我為顧慮到家人生計，不得不暫時保留日籍，以保持財產，因此我在留學期間，尚未辦理脫離日籍的手續，但我心中悵違先父遺訓，未嘗一日以日人自居，故在日美留學時皆自稱華籍，此種心理與事實，駐日公使館莊代辦、胡公使均深切瞭解。及至回國服務外交部僑務局時，鄭次長洪年、劉交涉員光謙等，均不以我向未脫離日籍稍存芥蒂，並素予信賴，而獲不次拔擢。在僑務局時由於遷調頻繁，為期能及時適應新任務，不得不朝乾夕惕，全力以赴。於是脫離日籍事因而又稽延未辦。是後僑務局脫離外交部成立僑務委員會，我以志在外交，亟思回部工作，苦無適當機緣。至十九年初，李錦綸先生榮任外交部次長，胡公使的公子世澤先生新任亞洲司司長，亟需羅致熟悉日本情形人員，辦理

對日外交。胡公使認為我是最適當的人選，遂晉言於胡司長，由鄭次長洪年向部長推荐，李次長復極力贊助，惟李次長與胡司長都知道我帶有雙重國籍會面囑我速設法脫離日籍。我此時已決定將在臺祖產處分，聲請脫離日本國籍，手續辦妥後，於同年五月十六日先行函陳李次長，旋接復函云：「臺端將在外交部擔任對日交涉事務，國籍問題至為重要，如一旦身分發生問題，勢將使臺端與外交部同遭困擾，亞洲司胡博士亦持同樣意見。一俟臺端取得脫離日籍證明時，外交部對臺端工作將作有利之考慮。」他們的意思仍應先行脫離日籍。

我辦理脫離日籍，係向戶籍所在地——臺灣臺南州聲請的，當我獲悉聲請書業經日方接受時，即於同年八月廿日，分別函陳李錦綸次長與胡世澤司長。他們復函對我已進行脫離日籍，都感到欣慰。胡司長並稱：如經提出證明，對發表任命，決無問題。

根據當時情形看，我要進入外交部工作，勢必須等到日方發給的喪失日籍證明書收到以後，方能實現。但事實上我在收到他們復函的不久，

即奉到外交部九月四日令，派為外交部科員，分發在亞洲司辦事，當時外交部長為王正廷博士。旋悉，因當時對日交涉頻繁，需人孔急，李錦綸胡世澤兩人商量結果，以我既已將臺灣的土地處分，且已申請脫離日籍，雖尚未接獲日本政府核准通知，祇是時間問題，為適應工作急需，乃荐我先行任職。我進部不久，即召開中日電信會議，部派吳委員南如為代表，擬派我為專門委員隨同與會，我當時因正在進行脫離日籍，若被派為正式出席人員，日方或會故意刁難。其時江幫辦華本建議我不妨向內政部呈請改名。我認為改名更足以引起誤會，如被日方探悉，公私兩無裨益，旋以事實迫不及待在開會時，仍派我隨同前往。

民國二十年四月，我收到臺南州警部發給二五三九號戶口調查簿抄本，註明於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喪失日本國籍。聞在我聲請脫離日籍之前，日本警察，曾經多次到我家訪問，勸誘先母寫信勸我回臺，為桑梓服務。惟先母對於我能恪遵先父遺訓，重返祖國懷抱，內心正私自慶幸！當然絲毫未受其煽動，不過在表面上先母仍作不亢不卑的解釋說：「母子關係雖是天生的，沒有

方法改變，但我現在是日本國民，他却是中國人，母子的政治立場不同，我不便寫信強其所難，即使寫信，他也是置之不理的。」等語。應付過去了。

待中日戰爭爆發以後，兩國間已立於敵對地位，其時我正任駐美金山總領事，更因辦理扣留廣源輪案，引起了日本政府對我個人的敵視。先母爲了留臺家人安全，曾親筆寫了一張明信片寄給我，內容非常簡單，直截了當的說：「從今以後，永遠與我脫離母子關係。」我奉到慈諭後，雖然知道這是先母的權宜之計，但是想到我爲祖國服務而忠孝不能兩全，累及家庭，不禁潸潸淚下。從此以後我即不敢再寄家書回臺了，只在每

逢新年寄賀年片一張報平安而已，但自內調以後，在陪都重慶時期連賀年片也不敢寄了！

我收到喪失日籍證明後，曾以南京市市民身分，呈請市政府轉內政部備案。旋接南京市市政府社會局二十一年一月五日通知，已轉呈內政部准予備案。至此我脫離日本國籍，回復中國國籍的手續，已臻完備。不料，一年半以後仍然有些餘波，使我困擾！受李專使錦綸（原戰外交部次長，奉派以專使身分赴美公幹。）於二十一年十月十七日自華盛頓會來函告知云：「據聞部內有部分人，認爲你具有日籍，將予控告，惟部次長未予理會。凡是對國家具有貢獻的人，往往會遭人忌嫉，從而製造困擾，予以打擊。你忠於職守和

長，而許多同仁久任一職，數年未獲晉升，因而相形見絀而生嫉妬，惟我自信愛國決不後人，問心無愧，故只一笑置之而已。

十三、我選擇外交工作的經過

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全國統一在望，人心極為振奮。我適此時返回祖國，初暫居上海，並未積極進行找工作：第一、因爲久居國外，對國內情形比較隔膜，必須作深入的瞭解。第二、國語文必須進一步的磨練，以求靈活的應付環境。第三、有個人前途的就業選擇，必須慎重考慮與尋求適當的機緣。

我以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科畢業，以及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科碩士的學歷，在當時至少有幾條途徑可供選擇：如應聘大學任教或服務金融機構，以及進入政府機關任職，不過我幾經考慮，仍以從事外交工作爲最適宜，因爲除了基於個人興趣和外國語文的基本條件之外，因我對日本情況有深切的瞭解，在當時錯綜複雜而又最困難的對日外交，或有所貢獻。另外一個想法，是經由政治外交的途徑，對於達成收復臺灣的願望最爲接近，於是決定以外交工作爲第一志願。

十六年秋間，經余日章博士的介紹，十七年一月十六日即奉到國民政府外交部僑務局第六號委任令：「茲委任黃朝琴君爲本局科員，派在指導科辦事，支三等一級薪，此令」。當時的局長是鍾榮光先生，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後來曾任職



民國十六年任外交部僑務局局長的鍾榮光與夫人合影。

南大學校長。此項工作雖不是直接從事外交工作，但已進入了外交部的範圍，我乃欣然前往報到，開始公務員的生涯。五月一日改派在第二科辦事，以期瞭解較多業務狀況。同月十九日，復奉派為本局特派員，赴廈門辦理僑務事宜。因友人劉君元謙任廈門交涉員，以中日人民間要案煩多，電邀赴廈充任秘書，協助辦理，我甫經到職，不料八月一日又復奉令調回僑局代理調查科長，半年之中，四易職位，頗有應接不暇之感。

十七年十月間，外交部僑務局改制獨立，升格為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採常務委員制，常務委員為李烈鈞、孔祥熙、宋淵源、周啓剛、丘辛駒等五人，委任令由五位常委連署，為唯一特殊的委令。我奉派在第一科服務，不久，僑委會鄭委員洪年、鍾前局長榮光，深知我熟悉南洋華僑情形，推荐為僑務協進會特派員，赴南洋各屬聯絡華僑，推展僑務，我歷時數月遍歷南洋各地，使僑胞間悉祖國現況，莫不喜形於色，因為他們對祖國的國民革命曾經作了很大的貢獻，獲得了「華僑為革命之母」的榮譽。我在旅途中完成「中華民族之海外發展」一書，旋由上海暨南大學出版。十八年十二月歸國時曾道經臺灣，遂順便考察臺灣的僑務，各地中華會館及旅臺僑胞，均予熱烈歡迎。高雄中華會館負責人周炳章、張錫祺兩先生知我已抵臺，他們正南下視察中，特聯合函邀我蒞高視察僑務，情詞懇切感人。函云：「朝琴同志：君致力僑務，為華僑謀福利，凡我僑衆，莫不泰斗是瞻，現既息肩渡臺，弟等何敢交臂失之？倘蒙不棄，乞於最短時間內，枉駕蒞

高，訓示一切，無任翹企仰盼之至。」函寄臺中中華會館常務首席曾博安先生轉交。高雄原在我考察計劃之中，復承專函邀請，足見僑胞對祖國的熱愛，與對我的關注。此行更意外獲得省親的機會，尤其是先母為之驚喜交集，當我稟明返回祖國服務佳況時，老人家欣慰之情，溢於眉宇，一別相隔六年餘，而先母當時健康如昔，家人均各平安，實予遊子一莫大的安慰。

日本據臺後，除了一部分來臺不久尚無恆產的外省籍人士，均不願入日本籍，均以華僑的身分居留，其後仍有閩粵人士陸續來臺謀生的，故臺灣各大城市都設有中華會館，我外交部並在臺北派駐有總領事，惟因環境特殊，僑務推展，較海外其他地區倍增艱難。我返國後，曾對開展臺灣僑務工作，提出了具體的建議，着重於確保華僑權益之外，並注重加強臺胞對祖國的向心力。十九年九月間，我剛轉入外交部時，接王達全先生自臺南來函云：「臺灣僑運，幸得先生愛護，鼎力協助玉成，一切提案得以通過三大大會最高機關，臺灣僑胞莫不深感先生之高誼隆情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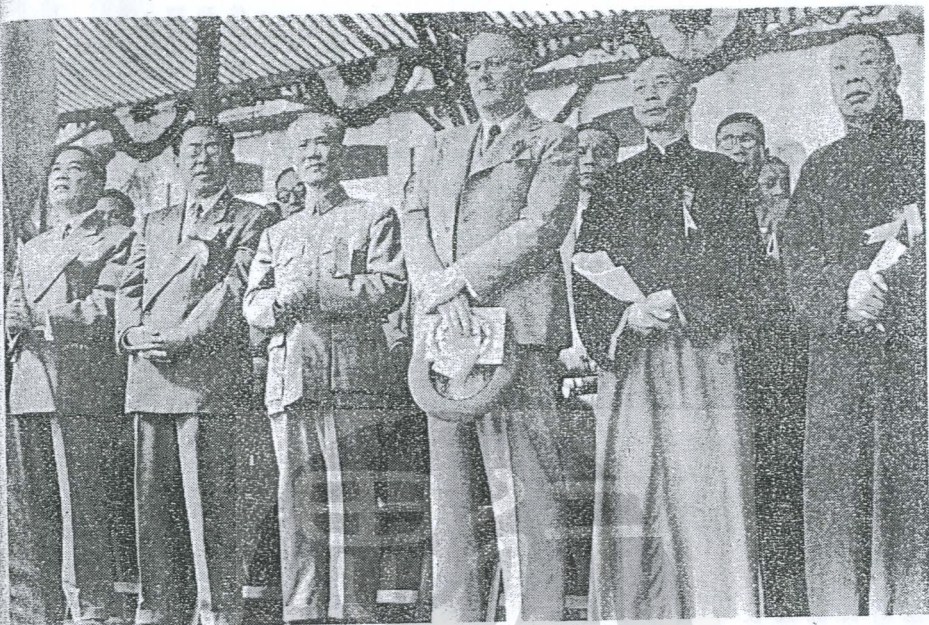
十九年九月，因外交部亞洲司需要熟諳日本事務的人員，我始得正式進入外交部服務，初任本部科員，在亞洲司辦事，從事對日外交。二十七年七月，調升秘書，仍兼亞洲司工作。旋九一八事變發生，對日外交處理更為困難，而對我個人實為一考驗機會，於是竭智盡慮，全力以赴，勞怨不辭，幸所供獻的意見，多獲上級重視，二十一年一月，即蒙擢升為第一科薦任三級科長，主管對日外交事宜，自是益勵忠勤，力圖報稱。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我國日亟，對日交涉更為頻繁，與日本公使接觸較多。當時部長陳友仁先生只懂英文，不懂日文，他是粵籍華僑，生長在國外，連國語也不會說，因此他在接見日本公使時，均用英語，而日本公使又不諳英語，於是接談時，便需要英、日互譯了，當時部內同仁具有英日兩種語言能力者極少，因此這一任務便成了我的專利了。我能很快的升任科長，語言方面的專長助益甚大。

十四、懷念李錦綸先生

民國二十年七月，我奉調外交部秘書，仍兼亞洲司工作，與專門委員譚紹華（後任駐巴西大使）同在李政務次長室辦公。九月十八日適逢王部長正廷先生的華誕，其親友等在杭州除他祝壽變消息外，並登載王部長在杭州做壽的消息，於是激發了南京學生的反感，開會議決要到外交部請願，並對王部長有不利消息，但王部長翌早即趕回南京，堅持要留在部內坐鎮，並接見請願的學生。

李次長錦綸先生以部長既留部，也表示要留部一同進退。詎料這批學生到部後，並未推派代表入部請願，即以亂石向部中擊擲，形同搗亂，於是王部長只得下樓走入電報科暫避，該科房間因保險關係，三面窗戶均設有鐵欄，一經進入，並沒有其他出路，旋被學生發現，即大批擁入，用訂書機猛擊王部長，致王部長頭破血流。另一批學生並一擁上樓，到達李次長辦公室門前，我



左二起黃、朝琴、陳誠、美國駐華大使、居正、鄒魯、國民政府十四年、國慶、閱兵、上台合影。

聞聲立即出而阻擋，被學生一推將我所佩帶的墨水筆擠斷，墨水溢出污染了襯衣。是時李次長正坐在辦公室內，學生遂即擁入，我為保護次長，情急智生，對眾學生說：「他是外國顧問，請勿孟浪。」學生信以為真，果未動手打他，旋即退去。按李次長係美國紐約華裔，其太夫人係美國人，他金髮碧眼酷似西人，竟因此而免被毆辱，亦云幸矣。

旋李次長奉令代理國務，曾召我與譚專門委員云：「汝二人與我共事很久，理應有資格升遷，惟因本人代理部務，為表示大公無私，雖有優缺，反不便派汝等去，仍請幫忙余工作。」我等聆示後，以深感知遇，表示義不容辭，工作更加倍努力。此時我負責核閱來文並接見賓客，代部長外出時，並隨車候道。

當中日交涉日趨緊張的時候，某日駐京英國大

使以南京空氣不佳為由，請代部長在夜間遷居英國大使官邸暫住，意即暗示日方或將有野蠻行動云。事後李代部長告訴我說：「英使雖屬善意，惟余身為政府首長，豈可托庇外人，個人已獻身黨國，義無反顧，故即婉謝。家屬不妨先遷安全地帶，以免有後顧之憂。」於是遂將代部長眷屬與我等眷屬先送上海暫住。我並搬入李代部長借住的鐵道部官邸與代部長同住。

李錦綸先生平易近人，毫無官架子，他的廣東話說得很流利，國語亦尚能應付，中文也能看得懂，惟書寫稍覺吃力。他對於國際公法極有研究，尤其對於外交問題有獨到見解，他對於中國歷史及社會情形，較陳友仁先生懂得更多，因他曾任廣州培正學校校長有年，且辦學成績卓著。陳友仁先生就任外交部長時，曾調我為亞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對日事務，因此時常見面，故知之甚詳。

李錦綸先生一生重義疏財，公私分明，他代理部務交卸時，尚餘留有機密費數萬元，此款是部長可以隨意動用的，他亦移交後任，為歷任部長所鮮有者。

民國三十九年秋，我奉派為出席聯合國大會全權代表，在紐約時，曾和他作數度盤桓，當時他老人家的風範依舊，不料從此一別，即成永訣！

十五、淞滬事變的餘波

民國廿一年一月十二日，我奉調亞洲司第一科科长不久，淞滬一八八事變爆發，亞洲司的工

作隨之緊張忙碌，並做了應變的一切準備，將重要公文裝箱，同時準備了汽車二輛，以便隨時搬運至安全地帶。二月一日晚十一時許，沈司令親鼎和我正在加班處理要公時，忽聞砲聲隆隆，持續傳來，據判斷或為下關停泊的日艦所發，我們為避免意外，當即督促工友們將重要公文箱搬運上車，由沈司令和我分別押運，急駛中山陵的臨時辦公處，幸在混亂中平安到達。

第二天，外交部即向日本公使致送節略，提出嚴重抗議，並通知各國及國聯，使之瞭解此次日艦挑釁行動。節略由亞洲司第一科主辦，全文如下：「據衛戍司令、警察廳長報告：『停泊南京下關之日本軍艦突於本月一日下午十一時後，陸續發砲八響，用探照燈探照，命中獅子山、下關車站、北極閣、清涼山、幕府山等處，同時發放機槍、步槍，至十二時後始止。中國方面為避免衝突，並未還擊等語。』日本陸戰隊不顧國聯行政院的決議，及九國條約與非戰公約，進攻上海中國軍隊，中國人民正在憤激之時，乃該日艦復在下關無故發砲放槍，實屬故意擴大事態，因此挑釁行為所發生之一切責任，應由日本方面完全擔負。茲特提出嚴重抗議，應請查照迅令該日艦等，不得再滋事端，並保留正當要求之權。」

二月九日，中日停戰會議，假上海英國領事館舉行，我方代表為郭次長泰祺等，日方代表為重光葵公使等，其他為英、美、法公使及意代辦等。會議進展情形及所討論問題，郭次長每日用電報分數次報告或請示，氣氛極為緊張。由於時間限制，郭次長欲將迭次報告中各國代表發言作

有系統的綜合分析，感覺困難。於是我遂畫定一表格，將討論各題，依次列於該表的上方橫線內，各國代表發言則列於相對下方直線內，再下橫格內則為結論，使上級核閱時，一目瞭然，殊感方便。當時羅部長文幹晚上在部內辦公，他常常泡在浴缸內看電報，我等持電呈閱或請示時，他時常先行發問，此時我即依照表列各項，迅速答復，不翻閱有關電稿後始作答，其效率簡速。前項停戰會議持續將近三個月之久，至五月五日雙方始簽訂停戰協定，局勢遂趨緩和，部內工作，亦逐漸恢復正常，數月來緊張生活，至此始得鬆一口氣。

十六、出席國難會議

民國廿一年一二八事變發生後，政府以首都南京接近戰區，於一月卅日宣言遷都洛陽辦公，各機關在南京原址改設辦事處。

四月七日，行政院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討論安內攘外的大計，由行政院長汪精衛主持，各部會首長工作報告。當時外交部長羅文幹率派去了新疆公幹，郭次長泰祺要出席淞滬停戰會議，劉次長崇傑還未到任，沈司令觀鼎又不能離部，會議時工作報告係以對日外交為主，我係主管科長，外交部乃派我代表出席，以一科長微職，竟與中央各部會首長並列出席於全國二百餘名碩彥的大會中作外交報告，真所謂「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會議開始後，依照議程首由海軍部長報告一二八當晚日海軍陸戰隊襲擊我閩北的經過，不料

陳部長紹寬正緩步上講臺時，會眾譁然！有人大聲叫：「當夜我海軍為何不抵抗？現在有甚麼好報告，不必報告了。」使陳部長大為難堪，祇好退回座位，未作報告。其次輪到我代表外交部作外交工作報告，在進行中，會場忽又有人提出質詢云：「我們要聽的是外交對策。」幸主席汪院長立即回答說：「外交對策，當由本人在小組會議時提出報告。」我的報告遂照常進行。

會議歷時一週結束，並發表大會宣言，主旨為：「對外必須有獨立自主的外交，對內必須充實國防準備。」

我前往洛陽開會，係由南京下關渡江到浦口，搭京浦路快車出發，乘的是藍色鋼皮車，內部寬暢舒適。在車中和汪代表竹一等攀談，途中還不寂寞。車過徐州時，曾以兩毛小洋買了燒雞一隻，此為當地有名的燒烤食物，香嫩可口。在徐州轉臨海路則達洛陽車站後，接待人員指定我乘汽車到「西工」，住外交部長的房間，我聽了真是受寵若驚！初不知怎樣擔當起這樣隆重的禮遇？！

「西工」原係一營房，民國初年建此營房時，稱為西營房工地，以後即簡稱「西工」。我初聞其名，誤以為古時帝王的西宮。到達該地時，見大門的建築尚稱堂皇，但進門後只看見是一排很長的平房，外有走廊，牆壁新近用白灰粉刷一新。房間約有六席大小，門窗係臨時用竹笆編的，日間沒有電燈，開起門窗既不透光，開了門窗寒風颯颯！房內置有一木床、一木桌、二只木凳，所謂部長房間，僅如是而已！我不禁暗中付之

急需增加兵力，維護後方；朱紹良主席會商之胡宗南。適民國廿七年冬，軍委會准在陝豫成立十個師，分配胡部四個師。於是，胡宗南除由「長淮招募處」招募壯丁外，再在陝西多徵兵一萬人；在天水成立四十八師，以羅列為師長。另以甘肅保安部隊成立一九一師，以楊德亮為師長；成立預備第七師，以嚴明為師長；再將五十三師併入，編成四十二軍，以楊德亮為軍長（一九一師師長由吳允周充任），統歸朱紹良就近節制指揮。

「動員指揮」 未竟全功

民國廿九年，中央將第十七軍團擴編為第四集團軍，即以胡宗南為總司令，直轄第一軍陶峙岳、第十六軍董釗、第十九軍李文等三個軍；另外歸胡指揮者為七十六軍李鐵軍、新十二軍劉元塘及騎三軍；歸胡督訓者四十二軍楊德亮、新七軍曹大中、廿七軍范漢傑、騎兵師馬祿及十九、卅六兩補訓處；集團軍總部仍在小雁塔。總共指揮督訓共九個軍、一個騎兵師、兩個補訓處。權責益重。

六月，會應山西方面戰況，兩次派軍援晉，廿七軍進入沁水高原太岳山區；九月，連克長治、長子等縣。當時，共軍也在高平、晉城各地，與我中央各軍及第二戰區防守部隊犬牙交錯，每與日寇暗通消息；以致廿七軍在該地處於兩面戒備之下，兩年之久。

民國卅年，第卅四集團軍由第一戰區改隸第八戰區，朱紹良長官對胡宗南一向器重倚界，所

以讓他在關中，放手辦事；他的志業，遂益能恢宏展佈了。

當時，關隴僅有胡宗南的一個集團軍，轄三個軍，而作戰地境，東起陝州，沿黃河西進，北至宜川，長一千一百華里，為抗日防河戰線；自宜川沿黃龍山北麓經洛川蔭形地帶至甘肅的環縣，為陝北隴東封鎖線，長一千三百華里。而戰區西接河西走廊，南至伏牛山，東西三千華里，南北七百華里，包括蘭州、西安以及天水、平涼、寶雞等戰略要地。連年來，東邊常有寇警，不得不幾度派軍渡河援晉；北方，則中共狡詐，必須予以有力的震懾。他以一個集團軍撐持其間，亦感防廣兵單；如不能阻敵兵西犯，如中共南下，關中一有動搖，西北必為糜爛，動關抗戰成敗。

再者，他感念抗戰以來，民衆並未切實動員協助軍隊，甚至臨危先自逃散，或則難民塞途，妨礙軍事行動，均足影響士氣。如何組織民衆協助軍隊抗敵防共，實乃當前迫切要務。於是，他與梁幹喬、蔣堅忍、顧希平、羅澤澤等籌商辦法，呈准朱長官。于二月上旬（新四軍江南事件後）開始組織「動員指揮部」於西安學廉路，朱長官兼總指揮，下設四處及鄆洛、商南兩區指揮部。鄆洛區指揮部設鄆縣，訓練動員封鎖縣以南各縣民衆，梁幹喬任指揮官；商南區指揮部設大荔，訓練動員河防以西各縣民衆，蔣堅忍任指揮官。鄆洛區關山隘口，皆與陝北中共為界，共軍隨時可以越界滋擾，同時派遣間諜人員，造謠生事，搖惑民衆心理。因此，動員工作非常艱難。梁幹喬苦心謀劃，排除萬難，先訓練沿線保甲長

以東伍、盤查、清剿、交通運輸諸法，次及當地壯丁，由北到南，數月之間，成效大著；對中共販運毒品，查緝尤嚴；對地方生產事業，發展尤為積極。大禍中共的嫉恨，在當地百般破壞，均無成效。乃縱反間於西安、蘭州等後方重地，捏造姓名，製造謠言，控訴梁幹喬，必去之而後快。朱長官不為所動。當時中共却有黔驢技窮之苦。

六月下旬，陝西省政府改組，兼主席朱紹良，與軍令部西安辦公廳主任熊斌對調。熊於接事之初，對梁幹喬誤會極深，即以「動員指揮部」妨礙政統一，有所煩言。胡宗南幾次向熊解釋此工作的重要性，和梁幹喬的實際成就，熊均不聽。九月，熊調蔣堅忍為大荔第三行政督察專員，暗示停止動員訓練之事，如有必需，應以專員名義付諸實施。

十二月十二日，胡宗南準備裁撤動員總指揮部，廿五日，令參謀長盛文向熊建議，鄆洛區動員指揮部裁撤後，可否仍照商南區之例，派梁幹喬為耀縣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熊不允，並堅持動員總指揮部和區指揮部應一律裁撤。因此，極具績效，且使中共深感困擾的陝北民衆動員工作，乃於當年年底結束。

延安共會聞訊，把酒慶祝，並謂「比打一次勝仗更有價值」云。

胡宗南以為各軍羣集關中，或戍守河防，陝北，或補充訓練；其團長以上軍官，欠缺訓練，思想意志，也須灌輸新知，堅其信念；乃于是年十月在王曲成立「卅四集團軍政校訓練班」。定期

集訓十五日，共辦兩期。他每天清晨均參加升旗訓話，下午參加各項戰鬥演習。第二期結業典禮時，並請朱紹良長官親臨主持。送別時，朱曾向他說出幾點語重心長的肺腑之言：

1. 黨國前途，決於本集團軍建軍能否成功，在建軍未成之先，應避免一切摩擦。
2. 在政治與軍事上，應有肝胆肺腑之人，應竭力物色。招搖之人，決不可共患難。
3. 應羅致經濟人才，如無經濟人才，如何辦大事？
4. 竭力儲備本地人才，並予寶貴重視。
5. 應有師友，諍諫缺失。
6. 山西情況如何，不宜輕率派兵過河。因如過河失敗，敵人可以隨之渡河，關中要受影響了。且過河不能消滅敵人，也不能克城池、拔據點。
7. 共黨南下時機，在我河防的失敗；我河防不失敗，他不致南下。

職還回番 安定後方

為便於督導第一、第二、第八、第十及蘇魯、冀、察等戰區軍事，軍委會原設「委員長行營」於天水，後遷西安。民國廿九年裁撤，改設「軍令部西安辦公廳」，民國卅一年主任熊斌與陝西省兼主席朱紹良對調，朱不克到任；中央乃派胡宗南兼任主任。

當時，關中部隊均歸胡宗南統率或督訓，番號衆多，統轄上也有問題。於是，他曾於民國卅一年一月奉令研究整編為三個集團軍的人事配置事宜。三月奉核定為：胡宗南以第八戰區副司令

長官兼卅四集團軍總司令，駐關中，轄第一、十六、九十等三個軍；范漢傑為第卅八集團軍總司令，駐平涼，轄第三、十七、四十二等三個軍；陶峙岳為第卅七集團軍總司令，駐三原，轄第卅六、五十七、八十等三個軍。

八月，蔣委員長與夫人蒞西北視察，胡宗南於廿八日迎候於酒泉。當晚，奉指示鞏固邊疆及推動新疆工作為要點。並訓示曰：「蘭州為我國政治中心，張掖為地理中心，汝等不可視為邊疆而言辛苦。」

廿九日起至卅一日，隨侍蔣委員長校閱嘉峪關、張掖、武威等部隊。

九月六日，開「西安會議」，蔣委員長親自主持，聽取各戰區各軍師長報告，會餐訓話。十日閉幕。十三日游翠華山，十四日離陝飛渝。

當時，軍中實施一人一職，胡宗南乃解除第卅四集團軍總司令兼職（由李延年接任），專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

先是，去年春，甘肅失意軍人劉羽，僭稱西北各民族「抗日救國聯軍總司令」，土豪張黃傑僭稱「西北農民義勇抗日救國集團軍總司令」，聯合河西回匪馬福善、番匪勒巴佛、川北悍匪唐倫、聚衆五、六萬人倡亂隴南，蹂躪廿餘縣，以「甘人治甘，反對徵兵徵糧，殺盡南蠻子」為號召。地方士紳，也多為匪張目，相互勾結。地方團隊，及甘省駐軍先後勦辦，均為所敗。民國卅二年四月中旬，匪主力竄至榆中，企圖規摹盾在榆中的成吉思汗靈柩，西南公路電話中斷數日，蘭州城門晝閉；南門外竟發現「甘人治甘，殺盡

南蠻子」標語，情勢相當緊急而混亂。朱紹良乃急電胡宗南另派勦辦進剿。

胡乃抽調担任河防的暫編五十九師盛文部星夜西開；並派第卅八集團軍范漢傑為隴南勦匪總指揮，盛文為勦匪前敵總指揮；甘省原駐第三軍暫十五師、青海騎兵旅等部隊，均歸盛文指揮。匪寇聽說盛文率部來擊，集中主力於隴南的西和與禮縣之間，以待待勞。

盛文至天水，作通盤部署，命第三軍的第七、十二、暫編十五師、交警部隊、甘青保安團，分別位署於天水、成縣、武都、西固、岷縣、臨洮、榆中、靜寧各縣，專任堵擊，防匪流竄；而將自己統率的暫編五十九師，分為三個縱隊，以林馥園為右縱隊，由天水、甘谷至武山，向南搜索；溫宗良團為左縱隊，由天水經成縣、武都向北搜索；自率盛鍾岳團為中央縱隊，由天水向禮縣、西和搜索前進。

六月五日，中央縱隊在西和、禮縣之間的馬烏、洮坪、閭井地區，遭遇匪軍，遂起激戰；左右兩縱隊，也趕到圍剿。由於此次進擊，係謀定而後動，所以各方配合良好，激戰至九日，終於將匪軍擊潰，斃傷匪偽官兵六千餘人，俘一萬三千餘人；潰逃北竄者仍約二萬人左右，士氣頹喪。盛軍乘勝追擊於岷縣、隴西之間，又斃傷匪軍千餘人。殘匪在柏林口，得岷河西岸回匪策應，竄回洮西老巢。盛軍追至洮河東岸喇嘛里。時洮北悍匪唐倫三千人，企圖竊據恭恭附近的蔣家山頑抗；盛設計誘降，令其隨軍効力；於是，匪軍戰志漸解。

(三) 模範軍人胡宗南

六月廿五日，盛以第三軍的第七師為右縱隊，暫編五十九師為左縱隊，渡洮河西進，左縱隊與匪激戰於喇叭山、鬼笑坡等地，生擒偽總司令張英傑、偽總指揮張英魁，擊斃回匪首領馬福善、馬占倉等。再搜索至拉卜楞寺，誘擒偽總司令劉羽。於是，全部首逆擒殺殆盡，徹底肅清。

朱紹良聞捷報，感謂：「自有勦匪以來，無有如此澈底者。」洮河各縣士紳改康樂縣的線家灘為蕩寇崖，勒石紀念。

血戰豫西 阻敵入陝

民國卅三年四月，敵軍以六個師團，三個獨立旅團、砲兵四個聯隊、工兵六個聯隊及其他特種兵，對我豫中發動攻擊，一面渡黃河南下，一面由信陽北上，另一支由商邱西進。因其有新從東北調來的坦克部隊，橫馳中原，我軍限於裝備，抵禦困難，加以備多力分，所以戰況劣勢，鄭州、許昌、臨洺、滎池等重要地均已失陷，洛陽被圍，第一戰區撤往盧氏。胡宗南奉命率八戰區四個軍兵力，增援豫西，鞏固潼關，防敵入陝。

五月十一日，胡宗南乃在靈寶、號略鎮之線佈防，以陝州為前進據點。

廿五日，洛陽淪陷。

卅日，奉令先發制人，進攻陝州，激戰兩日，未能成功。

敵軍為防我再興攻勢，乃於六月四日，由陝州以戰車六十餘輛，敵軍六七千，于十日攻陷函谷、靈寶，十一日再陷閿鄉。十二日，我十六軍谷正先部預三師，以及四十軍馬法五的一部，向敵反攻，敵軍損失甚重，加以我軍在潼關一帶部

署嚴密，無隙可乘。敵軍乃于十三日全面退卻。

中央以洛陽已淪陷，乃將關中併入第一戰區，以陳誠接任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與郭寄嶠副之，胡宗南的原第八戰區副長官司司令部也于八月卅一日裁撤。九月，敵軍十五萬人進犯桂林、柳州，情勢緊急。胡宗南奉令調卅六軍鍾松部率部赴渝，五十七軍劉安祺部空運桂林增援。

民國卅四年一月十二日，胡宗南接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調軍政部長），統轄四個集團、十六個軍、四十二個師、五個特種兵團。

自上年豫中會戰後，我軍常側擊平漢鐵路各站，敵為不安，且以為南陽、襄陽、老河口以及豫西、鄂北山地中，可能有我空軍轟炸東京的基地，同時以為南陽、襄陽、老河口，當為我軍儲運物資，裝備軍隊，向其大舉反攻的樞紐。為了解除此等威脅，乃於是年三月下旬，發動鄂北、豫西之戰。以五個師團、七萬餘人，分向南陽、老河口、襄陽、西峽口進犯。我軍以第五戰區負責南陽東南地區，第一戰區負責豫西南陽西北南召、李青店地區的作戰。

豫西方面的敵軍，由沙河店、舞陽、葉縣、魯山等地向我進犯。其右路廿二日在南召、李青店線上與我第一戰區的新編第八軍胡伯倫部激戰，廿六日襲陷鎮平，並從內鄉西北地區向豫西要地西峽口進攻，前鋒銳利。

胡宗南部署大軍，阻敵西進，先以八十五軍吳紹周部迎戰，于四月四日，誘敵深入重陽店以西的馬鞍橋，當令王仲廉總司令率第卅一集團軍的優勢兵力，設伏以待，激戰五日，斃敵八百餘

，毀戰車三輛，敵軍受創駭退，我遂乘勝恢復重陽店以東地區。

廿八日，另一路敵軍陷我內鄉，以萬人之衆，戰車四十輛，沿宛平公路向浙川進犯，卅日，敵以主力北上進攻西峽口，四月一日，一部襲佔浙川城。

我八十五軍吳紹周部堅守西峽口，與敵軍激戰數日，退守魁門關及重陽店。敵軍屢次猛攻，均不得逞。胡宗南部署反擊，調第一軍的一六七師與九十一軍嚴明部的六十一師，于五日拂曉，協同伏牛山區的各部隊將西峽口敵軍包圍痛擊，至七日晚，斃敵第一〇一師團長木村經應以下官兵四千餘人，獲大捷。

另一方面，敵軍為策應西峽口之戰，也于四月上旬以三千餘人，自洛陽西南的洛寧地區的長水鎮轉從北面向西峽口游擊。胡宗南乘機下令九十六軍李與中部與卅八軍張耀明部襲擊長水鎮，並進攻陝縣。

該方面的敵軍，以牙還牙的也以萬人之衆，于五月十六日起，分路進犯我官道口、靈寶，被我四十軍馬法五及九十軍嚴明夾擊，于廿四、五兩日不支潰逃。

敵軍以進攻失敗，同時，尚須抽調兵力，南下進行湘西之戰，遂不得不結束戰事退却而去。但其撤退時過份勉強，又被我軍處處襲擊，損失甚大。

當西峽口戰事正緊張之際，中國國民黨在渝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五月廿二日，胡宗南當選中央監察委員。（未完待續）